

《東華漢學》第 30 期；95-13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9 年 12 月

論姚合對郡齋詩系譜之承繼與創變 ——以〈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為核心*

林孜曄**

【摘要】

本文以姚合〈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為探討對象，有別於前人從詩歌內容或縣級僚佐身分分析此組詩於詩歌史上的意義，本文將此組詩置放於唐代郡齋詩之系譜下探討該組詩之意義。討論程序分為三部分：首先，釐清唐代郡齋詩之定義、內涵與代表性作者，以作為將〈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納入郡齋詩系譜下論述之基礎。其次，指出〈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的倦宦之情、「吏隱」意識、造景賞園活動，實承繼自韋應物、白居易在郡齋詩中已開闢出之主題，證明該組詩當納入郡齋詩之系譜中。最後，指出該組詩的吏隱意識則由「閑適」轉為「閑寥」、園景賞玩上則突顯化平凡為尖新之「詩景」，顯示姚合既能對前輩大家的郡齋

* 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卓見，助於本文修訂，謹致謝忱。惟限於個人學力，文中如尚有未盡恰當之處，自然概由筆者負責，懇祈方家不吝垂教。本文為 2018 年 3 月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投稿，內容取自當時尚未發表的博論，2019 年 1 月通過博論口試畢業，2019 年 3 月接獲刊登通知。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詩所開闢出之主題傳統有所體察，又能變創出屬於其個人美學風格的縣齋詩。

關鍵詞：姚合、武功縣中作三十首、郡齋詩、韋應物、「吏隱」主題

一、前言

姚合為中晚唐之交的重要詩人，生於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卒於唐文宗會昌二年（842），他與元和詩人韓愈、白居易、劉禹錫、張籍皆有所唱和往來，復與賈島以詩密切酬贈，又善於提攜後進，對晚唐詩人雍陶、朱慶餘、顧非熊等人皆有所影響。姚合在仕途上直到元和十一年（816）四十歲方才進士及第，於唐穆宗長慶年間，四十五歲時任武功縣主簿，任內三年期間，創作組詩〈武功縣中作三十首〉，書寫他出任武功縣時於縣齋中之生活，此組詩「為世傳誦」，「詩家皆謂之姚武功，其詩派亦稱武功體」，¹奠定其詩壇地位。²

關於姚合〈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研究，學界已累積豐富研究成果，李建崑分析組詩內容，指出姚合寫出縣居生活與寥落官況，而且一種閑適心態與隱逸情懷始終貫穿其間，反應詩人十分認同自大曆以來，流行於官員間的「隱於吏中」、「以吏為隱」的生活理想。³蔣寅則指出姚合以組詩的形式集中地表現「吏隱」主題，豐富了該主題之內涵，從而使「吏隱」主題得到深化，並認為「吏隱」主題的傳統源自於謝朓、韋應物、白居易等人的郡齋詩系譜中。⁴鍾曉峰則從姚合身為唐代縣級僚佐的

¹ 清·永瑤、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第四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51，頁70。

² 姚合的生卒年、仕宦歷程、交遊往來，本文參考日·松原朗，〈姚合の官曆と武功體〉，《晚唐詩の搖籃——張籍、姚合、賈島論》（東京：專修大學出版社，2012），頁227-229；以及王海霞，《姚合及其詩歌研究》（河北：河北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15-31；明海偉，《姚合及其詩歌研究》（湖北：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頁6-20之研究成果。上述文章根據新出土的〈姚合墓誌〉考證姚合生平，釐清多處疑點，有助於理解姚合生平。

³ 李建崑，〈析武功體〉，《中晚唐苦吟詩人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05），頁129-163。

⁴ 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3期（2005.3），頁26-31。

基層地方官員身分切入，認為其詩作寫出身為縣級地方官員，宦情蕭條冷淡，所處山縣荒僻、風景凋敝之官況生活，形成迥異於以州郡刺史為主之郡齋詩的書寫風格。⁵此外，葛曉音考察了郡齋詩源流發展，指出郡齋詩雖源自謝靈運、謝朓，卻要到中晚唐時期方才興盛，並指出韋應物是遙承二謝，大量創作郡齋詩的典型代表人物，而白居易、姚合則是繼大曆時期郡齋詩湧現的第一道高潮後的第二座高峰代表人物。⁶

上述研究已指出姚合〈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屬於郡齋詩系譜，本文想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問：姚合〈武功縣中作三十首〉與前人所開闢的郡齋詩傳統具有何種關係？他在哪寫方面承繼了前人所開拓的郡齋詩主題？又如何從這些主題之中變創出不同於前人的風格？

為了探討以上問題，我們有必要先釐清郡齋詩之定義、內涵及其系譜，以作為探討姚合組詩與郡齋詩之關係的前置基礎。關於唐代郡齋詩之研究，侯迺慧、赤井益久、葛曉音分別有專文探討，⁷因此，本文無意對唐人郡齋詩作全盤分析，而是在學者們的基礎之上加以界定郡齋詩之內涵，釐清郡齋詩的主題內容與系譜。進而從主題學的研究角度，⁸尋繹姚合〈武功縣中作三十首〉與郡齋詩傳統的傳承系譜，指出組詩中書寫倦宦之情、「吏隱」生活圖景等方面，實承繼自韋應物、白居易之郡齋詩。最後，探討姚合組詩在承繼前人主題之基礎上，加以變創出其個人美學風格之處。此外，本文在分析姚合詩之時，為了要突顯姚合縣齋詩

⁵ 鍾曉峰，〈中唐縣級僚佐的官況書寫——以王建、姚合為討論中心〉，《東華人文學報》第15期（2009.3），頁69-100。

⁶ 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0卷第1期（2013.1），頁88-103。

⁷ 分別見侯迺慧，〈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74期（1997.4），頁1-38。日·赤井益久，〈郡齋詩について〉，《中唐詩壇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頁463-481。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頁88-103。

⁸ 陳鵬翔言：「主題學探索的是相同主題（包含套語、意象和母題等）在不同時代不同作家手中的處理，據以了解時代的特徵和作家的『用意』。」見氏著，〈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收入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出版社，1983），頁15。

之特色，姚合擔任縣級官員期間，除了〈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以外所作之縣齋詩亦一併納入討論。

二、郡齋詩及其系譜

郡齋與縣齋是唐帝國分別設立在全國各地州郡與縣的地方衙署機構，分別用以安置出任州郡級之地方官員（如：刺史、司馬）、縣級地方官（如：縣令、縣丞、主簿）。郡齋、縣齋雖然在行政等級上有所區別，但是，兩者在場所空間的規劃上與功能性質相同。據建築學者的考察，郡齋、縣齋等地方衙署是庭院式布局，建築規模視其等第而定，衙署中主要建築為正廳，設在主庭院正中，遇有重要情況開啟正門，使用正廳；長官辦理公務多在正廳的附屬建築中，處所視衙署大小而定，小者即在正廳兩廂，大者在主庭院側另建院落。衙署內有架閣庫保存文牘，並附設官邸，多建於衙署後部或兩側，以供官員和眷屬居住。衙署所附屬的園林的位置則多設在衙署內，官邸之後，與之毗鄰。⁹

由於郡縣齋的空間設計多元，兼具公堂的森嚴性、官舍的私密性、宴遊的公共娛樂性等多重性質，成為唐人生活其中以創作之處，侯迺慧因而將唐人在其中所作詩歌稱為郡齋詩。¹⁰侯迺慧對郡齋詩的界定，乃是從郡齋此一場所作定義，而葛曉音則從創作主體與郡齋場所的關係作定義，將郡齋詩界定為「一種詩歌類型，指的是以出任郡縣的官吏為創作主體、在郡齋縣衙等創作的詩歌。其中相當一部分側重在描寫郡齋的日常生活和周邊環境以及視外郡為隱居的為官態度」。¹¹藉由兩位學者

⁹ 傅熹年，〈衙署〉，胡喬木等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引自網路電子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http://163.17.79.102/%A4%A4%B0%EA%A4j%A6%CA%AC%EC/Content.asp?ID=76118>，2017/7/26 作者讀取。以及趙鳴、張潔，〈試論我國古代的衙署園林〉，《中國園林》2003年第4期（2003.3），頁72-75。

¹⁰ 侯迺慧，〈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頁2。

¹¹ 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頁91。

的看法，本文認為郡齋詩乃是指出任於郡縣的地方官員，透過詩歌創作體現出他們在郡縣齋中的生活世界。詩人們生活於郡縣齋中，感受郡縣齋中的廳堂、寢室、園林等不同空間的設計所帶給他們的氣氛，並在其中展開不同的活動，因此，郡齋詩中所呈現出的郡縣齋環境乃是詩人們透過其身體感知所體驗而得，體現詩人們和場所相互影響、滲透的整體氣氛，而詩人們在郡縣齋中所體現的身體感知和情感亦不同於其他場所，有其獨特性，構成了郡齋詩的重要主題。

詩人們在郡齋中所呈現出的生活世界，乃是憑藉郡齋各種空間設計，讓詩人得以進行不同性質的活動，從而抒發出不同的身體感知與心境。像是郡齋的公堂，提供詩人們處理政務，詩人們書寫任職的樣貌，以及公務結束後，他們在其中讀書、省思從政為官的處境與心情。而郡齋的園林空間，則讓詩人們得以造景遊園，透過賞園的過程，感受到園林的幽靜氣氛，從而轉化了處理公事的疲倦，獲得身心閑適的感受。再者，園林提供詩人邀請客人同遊，享受宴集遊藝、吟創佳作等人情互動往來，以轉化心境。¹²儘管郡齋與縣齋在等級上雖有別，而各地郡縣等級的差異亦會影響到衙署設備的規格等級，然而不論等級差異，這些衙署所提供的空間規劃性質相同，詩人們在這些環境中皆書寫了仕宦心境、遊園賞景、宴集遊藝等活動，是以可歸類於郡齋詩之內。¹³

¹² 侯迺慧，〈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頁2；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頁90。

¹³ 以韋應物為例，將他任鄆縣令與滁州刺史之詩作一比較，可發現韋應物不論是在縣齋或郡齋中都書寫了相同主題，見〈縣內閒居贈溫公〉、〈縣齋〉、〈郡中西齋〉、〈花徑〉，前兩首詩是韋應物任鄆縣令時期之作，後兩首詩則是滁州刺史時期之作。第一首中，他在縣齋中與高僧相對靜坐，沉浸於對佛理體悟，從而將縣齋轉化為隔絕塵世的體道空間，第三首詩中，他以佛理修持己心，將蕭條的郡齋轉為與塵世隔絕之體道空間，而官場與權力地位已不再桎梏其心，兩者皆表達「吏隱」意識。至於第二首詩則書寫了他沉浸於春日園林欣欣向榮的愉快，閒適地吟詩、讀經書，以無為澹泊的心境生活於縣齋，第四首寫其與詩人、禪客同遊於園林之樂。由此來看，縣齋詩與郡齋詩並非截然不同的兩種詩歌類型，兩者在主題上有許多共同之處，即同樣呈現遊園賞景、作詩讀書、邀僧作客、「吏隱」意識。

郡齋詩系譜最早源自於六朝二謝，我們在其詩中已可看到他們描寫生活在郡齋中的為官感受與心境，如：謝靈運〈齋中讀書〉、謝朓〈高齋視事〉，而謝朓在郡齋時曾言：「淮揚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¹⁴在郡齋為官生活中感受悠閑如同隱者般自由的時刻，已透露出「以吏為隱」的端倪，然而謝朓並未深化此一觀念，這僅是其郡齋之作中唯一一首流露出將仕宦生活視為隱居的作品，在其他首作品中他呈現出的是對仕宦的憂愁，且他亦未曾書寫於郡齋中造景遊園的活動。到了初唐時期僅宋之問、岑參有少數作品，涉及到對郡齋園林遊賞的描寫，而後一直要到中唐韋應物、白居易方才大量地創作郡齋詩，拓展並豐富郡齋詩的各種主題。¹⁵韋應物歷任洛陽縣丞、鄆縣令以及滁州、江州、蘇州刺史等職務時皆書寫下生活於郡縣齋的經驗，「從各種角度描寫了自己在郡齋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感，反思為官理政之道，抒發懷鄉思歸之情，袒露進退出處的矛盾，還細緻描寫了郡齋中的景物，可以說是最典型的郡齋詩。」¹⁶白居易則在歷任盩厔縣尉、江州司馬，及忠州、杭州、蘇州刺史期間留下郡齋詩，為繼韋應物之後，創作郡齋詩數量最多者。白居易不論是在「吏隱」主題、造景遊園、感受郡縣當地風土表達仕宦心境上，實能繼韋應物之後，將郡齋詩各種主題發揮到極致，¹⁷是以兩人為中晚唐時期郡齋詩系譜的代表人物。

在郡齋詩所呈現的各種主題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即是「吏隱」主題。儘管謝朓的郡齋詩已透露出「以吏為隱」的想法，然而，謝朓尚未有意自覺地追求此一境界，且詩中亦未曾使用「吏隱」一詞。「吏隱」一詞其最初始的意涵亦和詩人們在郡齋中所產生的「吏隱」內涵有別，

¹⁴ 南齊·謝朓著，曹融南校注，〈在郡臥病呈沈尚書〉，《謝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329。

¹⁵ 參見日·赤井益久，〈郡齋詩について〉，頁463-481。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頁88-103。

¹⁶ 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頁92。韋應物對郡齋詩各種主題的拓展充實，可參拙作，〈論韋應物郡齋詩之「吏隱」觀及「吏隱空間」〉，《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33期（2018.4），頁35-72。

¹⁷ 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頁92。

據赤井益久的考察最早出現於初唐詩人宋之問、李嶠作於山莊別墅的詩中，在他們的詩作中「吏隱」一詞的語境及其意涵是指士人們在休沐之時，回到山莊別墅中過愜意的生活，從而感受到既能擁有官員的身分，又能於休假時享受到如同隱者般的自由生活。要到中唐大曆時期送別詩中大量出現「吏隱」一詞以描寫對方在郡縣齋中的生活，才揭示郡齋詩的「吏隱」意涵，其內涵乃是用以稱讚被送行之人所到任之州縣環境優美，想像對方在當地郡縣齋任官後，由於當地山水美好而可在郡縣齋中獲得一種如同隱居般的自由生活。¹⁸這時期送別詩中普遍出現「吏隱」描寫的現象，實是出自於社交禮儀的需要。松原朗考察唐代送別詩的形成過程時，即發現送別詩的表現手法中最为廣泛運用的手法是沿路敘景，究其原因是由於沿路敘景具有中立的、無關人稱的性格特徵，送別詩的創作往往發生於送別場合，具有強烈社交性質，在送別者與被送者關係不夠親密的情況下，此一表現手法不會導致冒犯對方與「毫無顧忌地踏入對方領地」的危險。¹⁹由此可推，送別詩中之所以普遍描寫對方所任的郡、縣齋坐擁山水美景而能過起如同隱者般的生活，是因為無論雙方關係之深淺，或者被送別者是因升遷、貶謫而出任地方官員，送別者稱讚對方所任之地環境優美、生活愉快是最為安全而不失社交禮儀的書寫技巧。

以真實的郡齋生活體驗落實郡齋詩之「吏隱」意涵者是韋應物，在〈縣齋〉、〈縣內閑居贈溫公〉、〈郡內閑居〉、〈郡中西齋〉等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將郡齋視為精神修養的空間，在其中達到了既能任官處理政務，又能忘卻塵世煩惱，而獲得如同隱居般的心靈自由，蔣寅將此種「吏隱」解釋為「雖居官而猶如隱者」，「首先是一種真實生活經驗的反映和表達」，而「當吏隱成了官人的自覺意識，成了他們刻意追求的生活理想，就會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使仕宦生活的一切——風景、

¹⁸ 日·赤井益久，〈中唐における「吏隱」について〉，《中唐詩壇の研究》，頁447-453。

¹⁹ 日·松原朗，《中國離別詩形成論考》（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126。

官署、齋室等都與吏隱之名聯繫起來。」²⁰韋應物的「以吏為隱」乃是由場所氣氛與個人身心修持努力兩方面相互交織而成，一方面郡齋的幽靜氣氛確實能讓人沉澱心情，隔絕掉外界的紛擾，另一方面如同蕭馳所指出的，韋應物乃是透過佛禪的靈修工夫泯滅了吏與隱在形跡上的分判，企致心靈的澹泊境界，擺落對仕宦執著、煩擾與束縛。²¹

到了白居易郡齋詩中的「吏隱」觀念，他承繼了韋應物「以吏為隱」的觀念，²²他任江州司馬時期所寫下的〈官舍內新鑿小池〉、〈約心〉、

²⁰ 蔣寅，〈古典詩歌中的「吏隱」〉，《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2004.3），頁53。唯蔣寅認為唐人所言「吏隱」「特指地位不高的小官僚詩人」（頁54），此說法本文不同意，以白居易為例，其郡齋詩中提及「吏隱」一詞之處，是他任蘇州刺史時期，其〈郡西亭偶詠〉言：「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為心」，蘇州為戶口數十萬以上的富庶上州，白居易為高層文官，故「吏隱」一詞不限於地位不高的詩人方能使用，見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885。以下引文為白居易詩者，皆出自此書，僅註明詩題、頁數。

²¹ 蕭馳，〈不平常的平常風物〉，《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448-450。

²² 與「吏隱」一詞相似的名詞還有「朝隱」、「宦隱」、「中隱」。這些詞彙的名稱雖近，然其內涵必須還原到說話者的語境中作解釋，方能揭示該詞彙的內涵。「朝隱」一詞見於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讚〉：「染跡朝隱，和而不同」，用以稱美東方朔在朝廷為官而能堅持身為士人的道德價值理想，是以即使在朝為官而個人的道德操守如同隱士，見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1857，及李紅霞，〈士人的文化心態與朝隱思想的流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91期（2007.7），頁72-76。「宦隱」一詞見於〈寄園銷夏圖〉：「宦隱園林稀熟客，片席名山栖穩」，指擁有官員身分，而於休假時遊賞園林感受到隱居自由，見清·陸以湑：《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67，而後近人劉維重《王維評傳》以「宦隱」一詞言王維「身在百官之中，心超十地之上」，蕭麗華藉此闡釋王維的「宦隱」乃是擁有官員身分，而在心境修養上能以般若空性的法門為官和生活，即使身在官場亦能不沾染於世俗利祿慾望而保有清淨之心，見氏著，〈試論王維之宦隱與大乘般若空性的關係——兼論王維詩中「空」的境界美〉，《臺大中文學報》第6期（1994.6），頁231-256。至於「中隱」一詞，見於白居易〈中隱〉詩中，其言：「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

〈睡起晏坐〉等詩作中，可看到他透過造景賞園與禪坐修持工夫，以轉化為官煩惱，獲得寂靜自由的境界，而到了他擔任杭州刺史、蘇州刺史時，則可發現在達致「吏隱」境界的途徑上他發展出和韋應物不同的方法。相較於韋應物側重於透過禪法修持內心，以超越塵世煩擾達到精神寂靜的境界，白居易在杭州、蘇州刺史任內發展成熟的「吏隱」思想則藉由選擇遠離權力中心而又能享有官職與閑暇的職位，以使他在處理公務之餘，能透過閑暇時間沉浸於園林幽美氣氛與眺望郡齋周遭美景的體驗中，使身心都處在舒適悠閑的狀態，擺落為官的煩惱，達到如隱者般自由的境界，如：〈郡西亭偶詠〉、〈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郡中即事〉、〈江樓晚眺，景物鮮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張員外〉。²³

郡齋詩中「吏隱」主題實需置放在唐人在郡齋詩中展現出在當地仕宦生活的感受與遊園賞景的活動來看，方才得以凸顯其獨特性。韋應物、白居易生活在郡縣齋中，最先感受到的實是當地州郡風土環境帶給身體感的舒適與否，以及由此身體感知影響到他們任官的疲倦、思鄉等

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頁 1765）其意涵乃是描述在仕宦的架構下，選擇可遠離朝廷鬥爭中心的官職任官，一方面可享有俸祿以支撐生活經濟，另一方面又可享受閑暇的時間以獲得個人生活的自由舒適，而他晚年擔任分司一職，定居洛陽履道園的生活正是「中隱」思想的具體實踐，相關討論參韓學宏，〈「霄漢風塵俱是繫」——白居易「中隱」思想研究〉，《中華學苑》第 52 期（1999.2），頁 131-158；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1.3），頁 85-124。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陽的「中隱」思想是從他開始任官時的「吏隱」觀念發展出來，兩者一脈相承，其「吏隱」思想的成熟時期為他擔任杭州、蘇州刺史於郡齋中的生活，關於白居易「吏隱」思想可參日·芳村弘道著，秦嵐等譯，《唐代的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288-294。由上述可知，「朝隱」、「宦隱」、「吏隱」、「中隱」等詞彙，相通之處在於強調以隱者心境為官，然而，如何達到隱者的心境，則涉及到不同場所空間與不同的修持工夫，而各人所能達到的隱者境界亦有所別，是以這些詞彙需還原到說話者的生命處境中作詮釋，方能完整揭示其意義。

²³ 日·赤井益久，〈中唐における「吏隱」について〉，頁 459-461。

情感的浮現。當這些情感浮現後，他們又透過造景遊園、修養工夫轉化身心，一方面以適應當地生活，另一方面則可擺落仕宦的憂煩達致如同隱者般自由的境界。像是韋應物任滁州刺史時，書寫下於滁州寒冷天候感到思鄉寂寞的詩作，再透過造景遊園、齋中坐禪的身體實踐活動，轉化身心，方才能達致以吏為隱的境界。又如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儘管蘇州多山水名勝且為富裕的大郡，然他因剛到任時公務繁忙、無暇出遊感到疲倦，而後藉閑暇的時間遊賞園林，讓身心浸潤於園林幽靜氣氛之中，獲致身心舒適愉快的狀態，方才達致「吏隱」境界。由此可見，「吏隱」境界的產生實有賴於詩人將自身融入郡齋的幽靜氣氛之中，讓身體感知和環境氣氛相互蘊涵交融，再加上詩人自身修持的努力方能實現。

三、〈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主題之承繼

以上確立郡齋詩內涵及其系譜後，本節論〈武功縣中作三十首〉於主題上承繼郡齋詩傳統之處。由於韋應物與白居易為郡齋詩系譜的代表人物，故本節及下節以此兩人的郡齋詩為代表和姚合之詩進行主題比較。〈武功縣中作三十首〉整組詩皆是寫他武功縣齋中生活之作，依其主題則可進一步分為以下兩大類：其一是書寫為官寥落、倦宦之情，這類主題的詩作見於第三、五、十一、十二、十四、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首。其二為書寫「吏隱」生活圖景，即身為官員而在心態上以隱者身分生活在縣齋，這一類主題之作可見於第一、二、四、六、七、九、十、十三、十八、十九首。此外，有些詩兩種主題兼具，呈現他因為厭倦所任官職，企圖藉由「吏隱」排遣為官煩悶，這類詩見於第八、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首中。以下分別就這兩個主題與前人關係作探討，以證明姚合組詩創作可納入郡齋詩的系譜之下。

（一）倦宦之情

透過衙署荒涼以表達在當地任官的寂寞，此一呈現技巧為姚合與韋應物、白居易的郡齋詩相同之處。韋應物任滁州刺史時抒發因當地荒涼而寂寞思歸之情，滁州時期是韋應物郡齋詩數量的巔峰，²⁴由於滁州為貧窮荒涼之州郡，他書寫下大量因環境荒涼、氣候異於北方，而感到為官落寞、渴望歸隱的情況：

守郡臥秋閣，四面盡荒山。此時聽夜雨，孤燈照窗間。藥園日蕪沒，書帷長自閑。（〈簡郡中諸生〉，頁328）

臥閣枉芳藻，覽旨悵秋晨。守郡猶羈寓，無以慰嘉賓。野曠歸雲盡，天清曉露新。池荷涼已至，窗梧落漸頻。風物殊京國，邑里但荒榛。（〈答王郎中〉，頁277）

今朝隔天末，空園傷獨遊。雨歇林木變，塘綠鳥聲幽。凋甿積逋稅，華鬢集新秋。誰言戀虎符，終當還舊丘。（〈月晦憶去年與親友曲水遊宴〉，頁325）

詩中道出由於滁州荒涼，與繁榮的長安為全然不同，當地貧窮而他卻要負責收稅，致使他感到愧疚，守在此地彷彿羈留在異鄉般不自由，甚至連遊園賞景活動亦無法排遣寂寞，徒增倦宦歸隱之情。韋應物分別根據滁州、蘇州的貧富情形，描寫了不同的風土經驗與心境，當地州郡豐饒或荒涼可為身為刺史的詩人帶來不同的風土經驗，呈現出愉快或倦宦思歸等不同心境。至於白居易在擔任偏僻的忠州刺史時亦有相同的埋怨：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窮獨人，強名為刺史。時時竊自哂，刺史豈如是？倉粟餒家人，黃縑裏妻子。莓苔翳冠帶，霧雨蠹樓雉。衙鼓暮復朝，郡齋臥還起。（〈南賓郡齋即事，寄楊萬州〉，頁854-855）

²⁴ 韋應物在滁州刺史時期所創作之作品量高達一百二十八首，統計參唐·韋應物著，孫望注，《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目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3-14、19。以下引文為韋應物詩者，皆出自此書，僅註明詩題、頁數。

白居易自嘲身為忠州刺史，不但俸祿不高，當地人民只能以「畚田粟給祿食，以黃絹支給充俸」（頁854-855），而他甚至誇張地言其以「莓苔翳冠帶」，形容其生活困窘。

姚合同樣地書寫為官生活寥落，而他與韋應物、白居易的差異則在於他是因為身為微官讓他感到仕途冷淡，門前無人來訪，寂寞難耐，彷彿在偏遠荒涼的城中作官：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武功縣中作〉其十四，頁254）

松原朗、鍾曉峰皆注意到實際上武功縣並不荒涼偏僻，姚合對武功縣的描繪並非實情。²⁵唐代縣分十等，²⁶據《元和郡縣圖志》，武功縣為京兆府的屬縣，在縣的等級中屬於上級的畿縣，距離長安為「一百四十里」²⁷，換算成今日里數為七十四公里，距離不遠。²⁸因此，姚合將此處描寫成「荒城」，實是他心理上對於所任主簿官職低下（正九品上），羨慕友人早已「得路」高升，產生失落感之餘對武功縣的主觀投射，藉刻劃荒涼環境以表達他為官的寥落。

再者，抱怨公務繁雜引發身辭官歸隱之念的表述，亦可見於白居易的郡齋詩中，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曾言：「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題西亭〉），

²⁵ 鍾曉峰，〈中唐縣級僚佐的官況書寫——以王建、姚合為討論中心〉，頁80；日·松原朗，〈姚合の官歴と武功體〉，《晚唐詩の搖籃——張籍、姚合、賈島論》，頁232。

²⁶ 翁俊雄，〈唐代的州縣等級制度〉，《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1991年3月），頁9。唐代州縣等地，可參《唐六典》：「四萬戶已上為上州，三萬戶已上為中州，不滿為下州。凡三都之縣，在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又望縣有八十五焉。其餘則六千戶已上為上縣，二千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唐·李林甫著，陳仲夫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3，頁73。

²⁷ 唐·李吉甫著，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武功縣，畿。東至府一百四十里。」

²⁸ 日本學者平岡武夫言唐代1步為1.47公尺，1里為529公尺，見氏著，《唐代之長安と洛陽（地圖）》（京都：同朋舍，1977），頁10。

頁1658)，蘇州官宅終究未能讓他排解為官的束縛感，是以他選擇了辭去官職回到家園，其言：「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別墅。既無婚嫁累，幸有歸休處。歸去誠已遲，猶勝不歸去」（〈自詠〉，卷21，頁1684）。姚合承繼了此點，更為強烈地凸顯他身為卑微官吏，處理瑣碎文書導致身心疲倦，感到被職務拘束的不自由，如：

微官如馬足，只是在泥塵……簿書銷眼力，杯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武功縣中作〉其三）²⁹

埋首於簿書之間，只讓他感到耗費心神，斲傷自然天性，因而也讓他產生想辭官歸隱的念頭。

要理解姚合在〈武功縣中作〉的倦宦之情，不能忽略其仕宦經歷。姚合原居陝州硤石，為了科舉而進京，考了三次，於元和十一年（816）四十歲時方才進士及第，隔年隨即入幕府跟隨魏博節度使先後擔任巡官、節度參謀、觀察支使等職。在幕府期間，姚合曾寫下數首積極昂揚，渴望為國效命的詩作。³⁰但三年多的戎旅生活，僅能負責文書工作而無法於戰場上有貢獻，逐漸磨滅其豪情壯志：

濫得進士名，才用苦不長。性僻藝亦獨，十年作詩章。六義雖粗成，名字猶未揚。將軍俯招引，遣脫儒衣裳。常恐虛受恩，不慣把刀槍。又無遠籌略，坐使虜滅亡。昨來發兵師，各各赴戰場。願我同老弱，不得隨戎行。丈夫生世間，職分貴所當。從軍不出門，豈異病在床。誰不戀其家，其家無風霜。鷹鶻念搏擊，豈貴食滿腸。（〈從軍行〉，頁586）

姚合對於自己年過四十，尚未一展長才，懷有許多不滿。不僅其性所好且琢磨十年的詩歌技藝，未能揚名詩壇，對於建立軍功亦無用武之地，他既不能持槍上戰場，亦未能策畫謀略，因而認為自己如同老、弱、病

²⁹ 唐·姚合著，吳河清注，《姚合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245。以下引文為姚合詩者，皆出自此書，僅註明詩題、頁數。

³⁰ 姚合在幕府期間的創作，可參張震英，〈詩句無人識，應須把劍看——論姚合反映幕府戎旅題材的作品〉，《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5期（2002.10），頁4-6。

者，一無是處。在此時期，姚合開始對身為低階文官，需處理繁瑣文書工作，產生倦宦之情：

每日尋兵籍，經年別酒徒。眼疼長不校，肺病且還無。僮僕驚衣窄，親情覺語粗。幾時得歸去，依舊作山夫。（〈從軍樂二首〉其一，頁545）

朝朝十指痛，唯署點兵符。貧賤依前在，顛狂一半無。身慵山友棄，膽賴酒杯扶。誰道〈從軍樂〉，年來緝白須。（〈從軍樂二首〉其二，頁546）

如同松原朗指出這組名為「從軍樂」的詩中，詩人所要傳達的卻是從軍之苦，唯松原朗認為客觀而言，姚合能於初任為官之際入幕府任從事，實為中唐以降文人初步任官常態，其俸祿與待遇已算佳，且有升遷機會，是以他認為此首詩中寫自己的貧、病並非屬實，而是姚合出於想建立自己文學風格的考量而刻意虛構。³¹此觀點本文認為宜再斟酌，蓋因賴瑞和指出在唐人眼中，幕職雖然俸錢不錯，但在唐人言中，始終不如朝官，入幕府任職，最佳的情況是得到幕主推薦，回到京城中央任中層官員再轉至高層官員，若像李商隱一生沉浮於幕府，實為官運不濟。³²是以，本文認為此詩中寫己貧賤，年近四十五歲已感傷嘆老，產生辭官歸隱的念頭，皆是因不滿於三年身為微官之緣故。

姚合卸下幕府工作後，接任武功縣主簿一職。儘管武功縣是長安近處的畿縣，賴瑞和指出在唐代在赤、畿等級的縣擔任縣令、縣丞、主簿、縣尉等職實為仕途升遷前景佳的美職。³³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從軍樂〉中由身體病痛、心態慵懶、生活貧賤、感嘆衰老所構成的倦宦之情，延續到〈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奠定組詩中倦宦之情的基調。姚合對武功

³¹ 日・松原朗，〈姚合の官歴と武功體〉，《晚唐詩の搖籃——張籍、姚合、賈島論》，頁240-241。

³² 賴瑞和，〈巡官、推官和掌書記〉，《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316。

³³ 賴瑞和，〈縣尉〉，《唐代基層文官》，頁188-189。

縣的厭倦，恐怕不僅只是因為武功縣令為低階官吏的緣故，更源自於長年處在基層官階的心理因素。

在〈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中，姚合頻頻以愁悶等字眼強烈表達倦宦之情：

一官無限日，愁悶欲何如。（〈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三，頁262）

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一，頁260）

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武功縣中作〉其十六，頁256）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武功縣中作〉其十四，頁254）

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開。（〈武功縣中作〉其十一，頁251）

「一官無限日，愁悶欲何如」強烈表達他為官極為愁悶，而造成詩人感到愁悶的主因即是身為卑微的官吏，需要面對逢迎長官和處理文書的狀況，「曉鐘驚睡覺，事事便相關」（〈武功縣中作〉其五，頁246），一早醒來就需要面對繁瑣的公務俗事，整日「悽悽守印床」、「終日逐人忙」（〈武功縣中作〉其十五，頁255），以致他「簿書銷眼力，杯酒耗心神」（〈武功縣中作〉其三，頁245），連飲酒澆愁都感到費神，相較於「故人多得路」，更顯出他「寂寞不相稱」（〈武功縣中作〉其十四，頁254），不滿於自己仍處卑位。他甚至以自我調侃的語調言「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武功縣中作〉其十二，頁252），言己地位卑微，連吃肉都逾越本分，且才能短小，本不當任官。

姚合抒發擔任卑職的苦悶，最為引人注目之處在於他從其生活境況上的貧困，以及身體病痛、衰老，乃至心態慵懶等各方面加以側寫當官之愁悶，在他之前，白居易擔任蘇州刺史時所作的郡齋詩中，已呈現出因忙於公務而感到身體疲倦、感傷衰老，如〈自歎〉：「豈獨年相迫，兼為病所侵。春來痰氣動，老去嗽聲深。眼暗猶操筆，頭斑未掛簪。因循過日月，真是俗人心。」（頁1908），而姚合這組詩更為集中且強烈地呈現出其貧病嘆老的狀態：

曉鐘驚睡覺，事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閑。（〈武功縣中作〉其十五，頁255）

擔任微官不僅身分低賤，甚至連生活都顯貧困落魄以致捉襟見肘，他以自我解嘲的筆法寫出「掃舍驚朝燕，尋方落壁魚」（〈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三，頁262），言其官舍簡陋窄小，連「朝燕」、「壁魚」此類屬於平民農村之家常見之物都出沒於屋舍間。貧賤生活引發其身體病痛與衰老，姚合自我調侃地言「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武功縣中作〉其七，頁248），實則是因天寒導致髮落體衰。又，組詩中頻繁出現「病」、「老」等字眼：

守官常臥病，學道別稱名。（〈武功縣中作〉其十九，頁259）

愁臥疑身病，貧居覺道寬。（〈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五，頁264）

久貧還易老，多病懶能醫。（〈武功縣中作〉其二十四，頁263）

白髮誰能鑷？年來四十餘。（〈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三，頁262）

病多為識藥，年老漸親僧。（〈武功縣中作〉其十四，頁254）

貧困與微官生活促使他多病，多病則又使他時時感到衰老，而年老與病痛則使他更為厭惡官職，渴望辭官隱居：

飲酒多成病，吟詩易常愁。殷勤問漁者，暫借手中鉤。（〈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七，頁266）

青衫迎驛使，白髮憶山居……須為長久事，歸去自耕鋤。（〈武功縣中作〉其二十六，頁265）

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武功縣中作〉其二十，頁260）

謀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武功縣中作〉其十七，頁257）

這些詩句中姚合表現了對歸隱的嚮往，他渴望藉由歸隱以獲得從職務束縛中解放的自由。

然而，儘管姚合如此厭惡為官，卻無法放下好不容易透過層層考試才擠身進入的官場世界，³⁴此種掙扎於仕隱之間的擺盪，可以說是構成組詩中愁悶情緒的根源：

³⁴ 姚合於長慶元年（841）春任武功縣主簿一職，而後於長慶三年（823）春卸任，同年秋天任萬年縣縣尉（從八品下），而後仕途一帆風順，不斷升遷，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等職，未曾辭官歸隱。

長憶青山下，深居遂性情。壘階溪石淨，燒竹灶煙輕。點筆圖雲勢，彈琴學鳥聲。今朝知縣印，夢裡百憂生。（〈武功縣中作〉其二十八，頁267）

此詩前三聯詩人沉浸於對過去的回憶中，寫山中隱居的自由美好，末聯語勢一轉，言今日任官充滿苦悶。詩中雖未明言當官種種不快，然透過昔日美好生活與今日之憂愁作對比，更能反襯今日之不樂。「百憂生」是極為強烈的情緒，正與組詩中不斷出現的「愁」字相互呼應，含蓄點出如今為官生活，讓他失去隱居山林中順隨性情的自由生活。姚合在仕隱之間的掙扎，在這首詩中表現地最為清楚：

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綠衣。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野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武功縣中作〉其十二，頁252）

詩中前兩聯以詼諧自嘲口吻刻劃為官的卑微，後兩聯分別以「野客」與「高僧」所給予的兩種對立建議，表達他擺盪在不知是要繼續忍耐為官或歸隱而去之間，掙扎於仕隱之間。

（二）「吏隱」生活圖景

姚合組詩中書寫了他身為官吏卻以隱者的態度在縣齋中展開造景賞園、吟詩飲酒、邀僧為客之「吏隱」生活圖景，刻意淡化他身為官吏的身分與職務，此類「吏隱」主題的書寫明顯地承繼自韋應物、白居易。以造景賞園為例，姚合言：

到官別無事，種得滿庭莎。（〈武功縣中作〉其九，頁250）

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過城。（〈武功縣中作〉其十六，頁256）

移山入縣宅，種竹上城牆。（〈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一，頁260）

他在縣齋庭院中種草、城牆上種竹，特意將溪澗中的水引入宅內蓄水池，堆土石以造假山，此一生活景象明顯是承繼自郡齋詩傳統。據筆者所見，韋應物是最早開始於郡齋詩之「吏隱」主題中，書寫造景活動者，他任鄆縣令時期，已在縣齋附近的西澗種柳，其言：「宰邑乖所願，僮

俛愧昔人。聊將休暇日，種柳西澗濱。置鍤息微倦，臨流睇歸雲。」（〈西澗種柳〉，頁171）藉種柳以排遣為官煩悶，而滁州刺史時期，更作有〈移海榴〉（頁294）、〈郡齋移杉〉（頁293）、〈題石橋〉（頁366）等詩，書寫他移植花木、巨石至郡齋園林內之活動。至於白居易任盩厔縣尉時，亦曾在官舍內藉由種竹排遣倦宦之情，如：「佐邑意不適，閉門秋草生。何以娛野性，種竹百餘莖。見此溪上色，憶得山中情。有時公事暇，盡日繞欄行。勿言根未固，勿言陰未成。已覺庭宇內，稍稍有餘清。最愛近窗臥，秋風枝有聲。」（〈新栽竹〉，頁725）。由此可證，姚合在組詩中書寫造景賞園的部分，實承繼自郡齋詩的傳統。

另外，姚合在組詩中，書寫自己抄寫經書、吟詩飲酒，並與野客、高僧等非官場中人來往，將縣齋轉化為隱居空間，亦可溯源至韋應物所開拓出的郡齋詩，姚合詩言：

齋心調筆硯，唯寫五千言。（〈武功縣中作〉其十，頁250）

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武功縣中作〉其十三，頁253）

從僧乞淨水，憑客報閑書……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賓客抽書讀，兒童斫竹騎。（〈武功縣中作〉其二十四，頁263）

野客教長醉，高僧勸卻歸。（〈武功縣中作〉其十二，頁252）

淨愛山僧飯，閑披野客衣。（〈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二，頁261）

姚合刻劃了他讀《道德經》，並與野客、僧人往來的樣貌，此一透過重組人際關係秩序，淡化為吏身分，強化隱者形象與隱居空間之方式，亦可見於韋應物任鄆縣令的縣齋詩中：

即事玩文墨，抱沖披道經。於焉日淡泊，徒使芳尊盈。（〈縣齋〉，頁172）

滿郭春風嵐已昏，鴉棲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縣內閑居贈溫公〉，頁160）

韋應物在縣齋內作詩飲酒、讀經書、與高僧夜對靜坐，這些情景的刻劃與姚合詩作有著高度的相似性，而他任滁州刺史，亦頻頻書寫與僧人、詩人相互來往的場景，如：「山花夾徑幽，古甃生苔澀……朝與詩人賞，

夜攜禪客入。自是塵外蹤，無令吏趨急。」（〈花徑〉，頁355）將吏役之人排除在吟詩飲酒、遊賞的對象之外，明顯可證姚合書寫自己與山僧、野人來往的情景，承繼自韋應物的郡齋詩。

本文透過以上的考察，說明姚合的縣齋組詩在書寫倦宦思歸、「吏隱」主題兩部分，實承繼前人在郡齋詩中所開拓出的主題，可證得姚合的縣齋詩乃屬於郡齋詩系譜下的嫡傳之作。不過，姚合的縣齋組詩是以五言律詩的形式寫成，而韋應物與白居易的郡齋詩作多以五言古詩寫成，五律在寫景、表意上較之於五古更為凝鍊，四聯八句結構在限制詩人內容書寫上的同時，亦限縮與突出詩人表現某一時刻經驗。姚合的組詩分別拆開來看，每一首就是書寫姚合在縣齋生活中的某一個片段，而當他採用組詩形式時，由於組詩「區別於單體詩歌最顯著的外在特徵就是體制的規模化、系統化，具有『文件夾』功能」，其所「特有的包容性和規模效應，構成了表達上的巨大優勢：宏放恣肆、多元展現，形成排山倒海之勢，氣象十分壯觀，極富震撼力和感染力。組詩正是以其內容的包容性、結構的系統性及抒情的獨特性，突破了單體詩歌凝固於特定時空的局限，使詩人曲折坎坷生活經歷、複雜微妙人生感悟和變化多端的情感歷程找到了非常合適的載體。」³⁵是以，組詩的形式讓他可以將縣齋生活中，倦於公務、渴望歸隱、造景賞園、與野客山僧相處等不同面向的生命經驗作完整呈現，在這些不同的面向中，浮現出以倦宦之情與「吏隱」生活圖景兩種主題構成主旋律的基調，而此兩者正是韋應物與白居易郡齋詩中的主題，因而這顯示姚合對郡齋詩傳統中已出現過之主題的回顧自覺。以上證明姚合縣齋詩與郡齋詩系譜的承繼關係，可作為下文進一步探究姚合組詩變創之基礎。

³⁵ 李正春，《唐代組詩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頁321-322

四、姚合之創變

姚合在書寫倦宦之情與「吏隱」生活兩大主題上承繼了郡齋詩傳統，然而，由於時代環境與個人際遇的差異，即使姚合的縣齋詩書寫了與前人相同的主题，其「吏隱」心境、園林風景體驗亦和前人有所差異，故以下就此二部分作討論。

（一）「吏隱」心境：由「閑適」到「閑寥」

姚合縣齋組詩一部分表達了他對為官的厭惡，另一部分的詩作則刻劃了他以慵懶態度疏離職務，為自己創造出「閑」的生活。上文中已提及姚合在組詩第三首、第十五首中主要表達對於身為微官的厭惡與整日俯仰隨人的忙碌情況。有趣的是，姚合在另一些詩中卻又描寫自我慵懶生活的模樣，蔣寅是最早注意到姚合在詩中呈現出「懶吏」形象的特殊性，他指出「回顧一下吏隱主題的表現史，姚合給自己畫了一幅古典詩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為正統觀念所不容的懶吏的自畫像」，³⁶但蔣寅卻沒留意到姚合之所以會刻劃「懶吏」形象，正是因為他極度厭惡職務之緣故，出於對職務的厭惡，姚合採取了慵懶散漫的態度以疏離政事，創造出悠閑生活：

簿籍誰能問？風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錢。還往嫌詩僻，親情怪酒顛。（〈武功縣中作〉其十七，頁257）

客至皆相笑，詩書滿臥床。愛閑求病假，因醉棄官方。（〈武功縣中作〉其七，頁248）

簿書多不會，簿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閑行懶繫腰。（〈武功縣中作〉其四，頁245）

³⁶ 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頁29。

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印朱沾墨硯，戶籍雜經書（〈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九，頁267-268）

姚合因酒稱病、藉病請假，他所塑造出的「懶吏」形象散漫而帶詼諧之趣，明明會寫簿書，卻故意言「簿書多不會」，疏懶狂僻到將重要的印鑑沾滿墨水而不收拾，亦將公文與養生之道經書籍相混雜。又，明明在第十七首中「隔月探支錢」，表示生活清貧，官祿不夠，故而需挪用到下個月的俸錢，卻在第四首中言「薄俸亦難銷」，故意言俸祿不多卻用不完，不無自我調侃之意，呈現出一位因酒醉、生病而喜閑臥在床的懶散樣貌。再者，他甚至誇張地言自己性情懶散到連出門都要帶枕頭而行，以戲謔方式強調其懶散：

性疏常愛臥，親故笑悠悠。縱出多攜枕，因衙始裹頭。上山方覺老，過寺暫忘愁。三考千餘日，低腰不擬休。（〈武功縣中作〉其六，頁247）

透過懶散他暫時得以忘卻因繁忙瑣碎公務所帶來的辛勞，為自己創造出閑散的狀態，以「吏隱」方式生活於縣齋中，繼續忍耐為官。

將姚合的「吏隱」生活和韋應物、白居易作一比較，可發現三人的共同性是身為官吏，藉由遊園或禪坐等不同活動以調解仕宦所產生的煩悶，達致如同隱者的自由境界。但是，細加分辨，探究三人對「吏隱」生活的體會卻有極大差異。首先，就韋應物而言，他是在寧靜的官舍中，從心境上斷絕了對塵世俗務的執著罣礙，藉由佛法安頓身心，從而獲得彷彿隱居山林的況味：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寄恆璨〉，頁340）

其心不起生滅，是以在官舍中亦能如寺僧般保有清靜之心，不為官職所束縛。韋應物的「吏隱」生活帶有宗教精神性的修養特質，郡齋的齋房則成為其體道修身的寧靜空間。

其次，就白居易而言，他最早是在江州司馬時期於〈江州司馬廳記〉一文中提出「吏隱」觀，誠如芳村弘道所論，由於他是處在貶謫不遇處

境之中，故其「吏隱」觀是以〈與元九書〉中所言「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獨善其身」之理作為支撐，³⁷以「閑適」作為實現「吏隱」境界的途徑，即安分知足於目前所擔任的司馬職位，進而肯定司馬一職無責任與事務需承擔，帶給他充裕的時間以實現「閑適」生活，從而達成「吏隱」境界。³⁸換言之，其「吏隱」生活的實質內涵即是「閑適」生活。白居易在杭州刺史時期，其「吏隱」情況與江州時期有別，司馬一職是安頓貶謫官員的冷淡職位，而刺史職責重大且事務多，但因刺史可免於任中央高官易捲入政治鬥爭的壓力，是以白居易將刺史一職視為閑忙適中，能於喧靜之間獲得平衡的生活，而郡齋園林則是實現「吏隱」的最佳場所。不過，撇開其前後期官職的變化，其「吏隱」境地皆是以「閑適」生活為實質內涵。至於「閑適」之意涵則如同西村富美子所考察的，由「閑」與「適」兩個概念組合而成；³⁹而埋田重夫進一步檢所白居易文集中所有以「閑」或「適」組合成的詞彙，以對兩字的核心概念作出定義，「閑」是指置身於完全從公務中解放出來的自由狀態，「適」是指身心皆處在完全沒有感受到拘束與不舒適的境地，又言儘管兩字概念有別，但其共通性則在於指生理與心理皆處在滿足愉快的狀態，且只有「閑」與「適」同時達成時，方能實現「閑適」生活，⁴⁰像是：

朝就高齋上，熏然負暄臥。晚下小池前，澹然臨水坐。已約終身心，長如今日過。（〈約心〉，卷7，頁604）——江州司馬時期平旦起視事，亭午臥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琴書前。況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潮來一憑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弦。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閑。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

³⁷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2794。

³⁸ 日·芳村弘道，《唐代的詩人研究》，頁198-199。

³⁹ 日·西村富美子，〈白居易の閑適詩について——下邳退居時〉，古田敬一教授退官記念事業會編：《古田教授退官記念中国文学語学論集》（東京：東方書店，1985），頁398-399。

⁴⁰ 日·埋田重夫，〈白居易の閑適詩——詩人に復原力を與えるもの〉，《白居易研究——閑適の詩想》（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8-9。

唯茲郡閣內，翫靜得中間。（〈郡亭〉，卷8，頁681）——杭州刺史時期

姑且不論江州司馬與杭州刺史職位差異，及其帶給白居易分別處在逆境與順境的感受分別，可發現無論是任司馬或刺史，白居易極為強調同時從生理與心理上的滿足舒適以實現「吏隱」生活，中木愛已指出「白居易將最高層次的精神快樂轉換為最低層次的生理滿足，將抽象的幸福觀念通過具體感官的舒適感覺來描寫」，⁴¹其「閑適世界大半是由『飲酒』與『睡眠』作為基本單位而構成」，是白居易「維持健康與實現忘我境地的重要手段」。⁴²在其郡齋詩中，可印證他確實是藉由充足睡眠帶來生理的復原與心理的滿足，以及賞景所引發視覺、聽覺上的愉悅，以實現愉快的「吏隱」境地。

其三，從韋應物到白居易的「吏隱」生活中，我們可以發現「閑」具有重要的意義，「閑」在他們的詩中皆是指身心處從公務中解放出來的自由狀態。韋應物在此狀態中，體悟到心靈的清靜與郡齋的寧靜氣氛相融一體的境界，而白居易則是透過從生理到心理上的滿足舒適，如：睡眠、賞景，以達到身心愉悅的境界。但是，到了姚合詩中，雖然他也喜愛「閑」，以「閑」字以言他處在從公務解放出來的狀態，然而，其「閑」的境地往往帶著蕭條、寂寥、散漫的心境：

客至皆相笑，詩書滿臥床。愛閑求病假，因醉棄官方。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武功縣中作〉其七，頁248）

姚合藉病假與酒醉擺脫職務，為自己創造出「閑」的狀態。可是，姚合的「閑」，缺乏韋應物詩中因「閑」而修持身心以獲得心靈清靜，並與環境共同融合在寧靜氣氛中，也缺少了白居易詩中由於「閑」而感到從生理至心理皆處於滿足舒適的境地。姚合處於「閑」之狀態時，其生理

⁴¹ 日·中木愛，〈試論白居易詩中生理層次的「閑適」表現——兼及姚合閑適詩〉，《中華文史論叢》第94期（2009.2），頁104。

⁴² 日·埋田重夫，〈白居易の閑適詩——詩人に復原力を與えるもの〉，頁14。

並未因睡眠休息而獲得滿足與舒適，「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顯示其身體的羸弱，同時亦暗示其心境之落寞。

再者，姚合在從事造景等表現「閑」之活動時，其快樂之中摻雜著落寞、蕭索的況味，像是：

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武功縣中作〉其四，頁245-246）

即使種花引來蝴蝶可賞，添石以讓雲朵聚集，他沉浸在這些園藝活動所帶來的快樂之時，仍舊意識到此番行徑乃是苦中作樂，寬慰自己身為縣主簿的寂寥。

姚合透過休假之時，隨意任性地從事飲酒、遊賞、讀書等讓他排遣愁悶的活動，從「閑」之中達到散漫、懶散的狀態，擺脫為官的束縛：

曉鐘驚睡覺，事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閑。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長羨劉伶輩，高眠出世間。（〈武功縣中作〉其五，頁246）

閉門風雨裏，落葉與階齊。野客嫌杯小，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尋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閑行只杖藜。（〈武功縣中作〉其十八，頁258）

姚合寫自己任意讀書不求甚解，任性地喝酒，貪於睡覺，隨意散步作詩，藉由這些活動，暫時擺落為官憂愁，而能繼續甘於為官的生活：

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生宜縣僻，說品喜官微。淨愛山僧飯，閑披野客衣。唯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二，頁261）

這首詩中，前三聯刻劃自己不需辭官歸隱，甘於任縣吏，因為閑暇之時，他可以過著如同野客、山僧的閑散生活，末聯則「幽谷鳥」喻山中幽居者，表達憐惜隱者不懂入城飛，意味自己無需過山中隱者的生活，而可透過「吏隱」方式達到自由境地。又如：「醉臥誰知叫，閑書不著行。人間長檢束，與此豈相當。」（〈武功縣中作〉其十五，頁255），亦肯定閑散生活讓他得以甘於為官生活。

由上可知，儘管姚合承繼了韋應物、白居易郡齋詩中的「吏隱」主題，透過造景、作詩、飲酒、遊園活動以實踐「吏隱」生活，但是，姚合與韋應物、白居易最大之差異即在於其「吏隱」心境，乃是以閑散、寂寥的狀態化解為官愁悶。

（二）園林經驗：化平凡為尖新之「詩景」

韋應物與白居易的郡齋詩描寫州郡的山水環境時，往往依據該地的風土情況如實呈現，當他們身處在中下級的州郡時，往往刻劃山水荒涼、氣候寒冷，如：韋應物在滁州、白居易在忠州時，以表達他們在當地為官的不適應與不遇之感；當他們任上州刺史時，則描繪當地山水之優美，以顯示他們任官之愉快，如：韋應物在蘇州、白居易在杭州時。然而，無論韋應物、白居易處在貧困或富裕之州，當他們帶著「吏隱」意識以書寫郡齋園景時，往往呈現出園景的美麗樣貌，如：韋應物任滁州刺史時特意從山中移植珍貴的花木；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時，寫下〈喜山石榴花開（自注：去年自廬山移來）〉（頁1472）、〈種荔枝〉（頁1456），言移植山石榴與欣賞當地特有的荔枝樹之美。

但是，姚合不僅刻意將其縣齋所在之處，描繪成荒涼偏僻的村落，更將所身處縣齋園林景觀描繪成蕭條荒涼之樣貌，這是因為縣齋等級較郡齋低，而縣吏俸祿亦較刺史少，是以縣齋園林之規模不可能等同於郡齋；另一方面，姚合亦刻意以蕭條景象以展現其「吏隱」生活景象不同於前人之處：

縣去帝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繞舍惟藤架，侵階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書題。（〈武功縣中作〉其一，頁242-243）

縣僻仍牢落，遊人到便回。路當邊地去，村入郭門來。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開。可曾衙小吏，恐謂踏青苔。（〈武功縣中作〉其十一，頁251）

姚合筆下「吏隱」景觀與韋應物、白居易最大差異，就在於他抹去了韋應物、白居易郡齋園林中象徵山林隱逸的珍貴花木與亭台樓閣等幽靜空間，轉而寫起平民百姓化的村野景象。他在縣齋中豢養馬，此等象徵官員身分配備的動物卻與山鹿、雞、野禽等村野動物混雜而處。另外，園中除了種花，還有藤架、藥畦等可供食用的普通作物，以及隨處可見的普通莎草，其言：「到官無別事，種得滿庭莎」（〈武功縣中作〉其九，頁250）、「月出方能起，庭前看種莎」（〈武功縣中作〉其十三，頁253），顯示其園林缺少奇特花木。儘管園中引水蓄池，其景象亦顯荒涼，如：「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武功縣中作〉其十六，頁256）、「露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縣中秋宿〉，頁437-438），顯示其園池之蕭瑟，還因縣齋過於偏僻而無遊客，導致青苔長滿門前路徑。至於其周遭則是「夜犬因風吠，鄰雞帶雨鳴」（〈武功縣中作〉其十九，頁259）、「鄰里皆相愛，門開數見過」（〈武功縣中作〉其九，頁249）等農村雞犬相聞之景象，全無衙署的森嚴性。

儘管姚合所關注的景物多為園林中常見的花、草、樹木、蜂、蝶、鳥等物，如同元代方回所言：

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⁴³

詩歌意象單一，學者張震英進而指出，「姚合詩歌所用意象……自然景物多集於山、水、雲、霧、雲、寺、階、石等上，視野多顯得狹小而侷促；動物昆蟲類主要集中於馬、鳥、鶴、蜂、蝶、鶯、蟲幾種，在詩篇中出現密集，一步不可離，顯得單一而缺少變化；植物類則不出竹、花、菊、樹、葉、草等，略顯單調。」⁴⁴但是，姚合能善用五言對句的技巧構思，呈現體驗景物的獨特視角，致使詩句帶有尖新纖巧的風格。像是

⁴³ 元·方回選評，李慶賈集評，《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10，頁340。

⁴⁴ 張震英，〈論武功體〉，《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3期（2003.5），頁36。

在一般常見景物上，刻意鍛鍊動詞，以表達他在這些常見景物中所觀察到的細小獨特趣味：

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武功縣中作〉其四，頁245）

掃舍驚巢燕，尋方落壁魚。（〈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三，頁262）

花、蝶、雲、石為遊園常見景象，詩人卻能從造景活動加以構思，言蝶因他移花而來，雲因他買石而聚集；至於「巢燕」、「壁魚」等或平凡或卑瑣之物，詩人卻將之納入他打掃屋舍、尋找藥方的日常活動中，以「驚」、「落」等動詞，突顯這些小事物帶給他的驚奇。又或者用對句的技巧，加以構思，如：

驚蝶遺花蕊，遊蜂帶蜜香。（〈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一，頁260）

夜犬因風吠，鄰雞帶雨鳴。（〈武功縣中作〉其十九，頁259）

園林中蜂、蝶飛舞於花叢間乃是常見之景，詩人刻意透過工整的對仗技巧，以表達他細微地觀察到蝴蝶驚忙中遺落花蕊，而蜂蜜則帶著蜜香而飛。至於村落裡雞鳴狗吠乃是常見景象，詩人刻意言他觀察到犬因風的騷動而吠，而雞在雨聲中鳴叫。再如：

迎雨緣池草，摧花倚樹風。（〈遊春十二首〉其三，頁301）

弄日鶯狂語，迎風蝶倒飛。（〈遊春十二首〉其十一，頁306）

露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縣中秋宿〉，頁437-438）

土融凝野色，冰敗滿池聲。（〈遊春十二首〉其四，頁301）

詩人所精心刻劃者，就在於這些小景物的細微變化，觀察面承雨水而沿池邊生長之草，寫摧殘花朵、樹木之風；觀察以鳴聲攪擾日光之鳥，寫迎風而倒飛之蝶；寫庭院之中沾著露水之草及竹林中為螢火蟲光所照亮之禽；寫雪化土融致使春野氣息更加明顯，冰碎而造成池中聲響。為了突顯律詩的對仗技巧，詩人在寫園景上已失去韋應物、白居易以五言古詩寫園景時，以長篇鋪陳描摹事物，寫出自己於園中徐緩優遊的閑適之感，取而代之的是詩人將日常生活中所體驗到的平凡細微之小景，近乎孜孜矻矻地苦心構思，以藝術提煉的詩意呈現。

誠如紀昀評姚合詩「其自作則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⁴⁵姚合身為一名縣吏，他既缺乏韋應物、白居易擔任上州刺史，享有高規格的亭臺水榭園林空間，以資從容遊賞，達致閑適忘憂的境地，另一方面，即使過著「吏隱」生活，他仍無法化解身為卑微官吏、羨慕故人都已高就的愁悶。在此情況下，創作詩歌成為姚合無法在社會處境上獲得自我肯定的狀況下的另一條出路。

在縣齋中作詩，於姚合具兩層意義：其一，與韋應物、白居易在郡齋中作詩相同，是為了突顯身為官吏卻不處理公務，以隱者姿態生活的樣貌。其二，創作不只是為了抒發情感，創作本身即是一項值得苦心追求的詩歌藝術，可作為自我生命價值的定位。姚合在武功縣的生活經常強調他吟詩的「詩人」形象，蔣寅是最早注意到此現象者，指出他呈現了一個「詩吏」的形象。⁴⁶此外，陳家煌指出在中唐時期，「詩人」一詞開始大量出現，當時人認為「詩名」是獲取社會身分與良好聲名的表徵，並以姚合於大和年間（831-833左右）寄詩給華州刺史言：「養生非酒病，難隱是詩名」（〈寄華州李中丞〉，頁160）為例，顯示「詩名」為時人所重視。⁴⁷鍾曉峰則進而指出姚合「意識到『詩名』是個體在社會空間被認識、肯定的重要憑藉，也是建立社會聲名的重要方式」，⁴⁸又指出「將詩人與地方官吏，特別是縣級僚佐身分結合的現象，姚合是重要的代表，其在武功縣中作的〈武功縣中作三十首〉、〈遊春十二首〉組詩，最為集中地反映官吏與詩人身分的重疊、交融」。⁴⁹

⁴⁵ 清·永瑤、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第四冊，卷151，頁70。

⁴⁶ 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頁30。

⁴⁷ 陳家煌，〈論中唐「詩人概念」與「詩人身分」〉，《文與哲》第17期（2010.12），頁159、165。

⁴⁸ 鍾曉峰，〈論晚唐的「詩名」：一個文學社會學的考察〉，《師大學報》第57期（2012.3），頁78。

⁴⁹ 鍾曉峰，〈詩領域的自覺：晚唐的「詩人」論述〉，《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4期（2012.6），頁60。

本文想進一步說的是，姚合雖然深知「詩名」的重要性，但是，不論是否能以詩立名，取得社會地位與身後名，姚合已先肯定從事詩歌創作這一項技藝本身即是有價值意義之事，可見姚合並非以全然功利性質的角度看待詩歌創作。姚合任武功縣吏之前已言：「性僻藝亦獨，十年作詩章」（〈從軍行〉，頁586），可見他很早就對作詩一事產生執著，在他還在任縣吏，未能以詩成名之前，即以「詩人」身分界定自我的生命價值：

疏散無世用，為文乏天格。把筆日不休，忽忽有所得。所得良自慰，不求他人識。子獨訪我來，致詩過相飾。君子無浮言，此詩應亦直。但慮憂我深，鑒亦隨之惑。子在名場中，屢戰還屢北。我無數子明，端坐空歎息。昨聞過春關，名繫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難測。詩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豈隨尋常人，五藏為酒食。期來作酬章，危坐吟到夕。難為聞其辭，益貴我紙墨。

（〈答韓湘〉，頁591）

此詩為酬答韓湘之作，⁵⁰詩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由「疏散無世用」可知姚合對於自己僅能任職基層縣級官員，帶有落寞之情，無法從中獲得對自己的肯定。二、由「把筆日不休，忽忽有所得。所得良自慰，不求他人識」可知，他肯定作詩這件事對其生命有意義，願持之以恆付出心力，儘管姚合對自我之創作仍未滿意，此時亦尚未能以「詩名」取得聲譽，但是，只要發現詩藝稍有進步，即能從中獲得寬慰。三、由於功名仕宦非全然操之在我，而有待時運之處，唯有堅持作詩一事是完全取決於個人，因此，他以「詩人」自我標榜，⁵¹以此身分將自己和尋常人加以作區別，對於創作一事有所堅持。

⁵⁰ 韓湘為長慶三年進士，此年春天姚合從武功縣主簿退任，秋天轉任萬年縣尉，參唐·姚合著，吳河清校注，《姚合詩集校注》，頁76。

⁵¹ 關於姚合以「峭冷」作為其「詩人」的特質，見鍾曉峰，《詩藝的對話與影響：元和詩人交往詩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頁223-236。

相較之下，韋應物在郡齋中作詩，是為了藉由詩歌與人往來交流，化解為官苦悶，如韋應物任滁州刺史，四周環境荒涼，他以詩會友，作詩排遣寂寞，其詩云：「守郡臥秋閣，四面盡荒山。此時聽夜雨，孤燈照窗間。藥園日蕪沒，書帷長自閑。惟當上客至，論詩一解顏。」（〈簡郡中諸生〉，頁328）而在蘇州刺史任上舉辦宴會，以詩會友，表達以詩交流之喜。白居易則以「詩人」身分作為自我定位，並同樣肯定「以詩立名」的價值，⁵²此為姚合與白居易共同之處。然而，白居易的作詩態度是如同陳家煌所言，是因出於喜愛作詩歌，想把閑適愉快或哀傷之情抒發出來而作詩。⁵³姚合作詩，卻不僅只是為了抒發情緒，更帶有為了追求詩歌技藝而耽溺於苦心構思的意涵，甚至即便作詩無法排遣為官愁悶，他也依然堅持創作：

作吏無能事，為文蓄致功。詩標八病外，心落百憂中。拜別登朝客，歸依煉藥翁。不知還往內，誰與此心同。（〈武功縣中作〉其三十，頁268）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武功縣中作〉其十四，頁254）

在這兩首詩中，可發現姚合處在羨慕故人皆已高升，對縣吏一職更感厭惡卻無法斷然辭官歸隱的憂愁中，鍛鍊詩藝一事成為其寂寥生活中唯一的寄託，即使「吟詩易長愁」（〈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七，頁266），他亦堅持創作不斷。

姚合出於對「詩人」身分意識的自覺，不僅將縣吏生活化為詩歌題材，更重要的是，他帶著詩歌藝術的框架來觀看所有景色，不論是山水

⁵² 關於白居易對「詩人」身分的自覺，陳家煌指出白居易左遷江州司馬之際，自編詩集，言「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頁1335），面對貶謫困頓處境，開始逐漸確立其詩人主體的自我意識，見氏著，《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頁117。

⁵³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頁139-140。

美景，或是荒涼平凡之景都具有構成詩歌材料的價值，其言：「閑坐饒詩景，高眠長道情」（〈送徐員外赴河中從事〉，頁29），在送行對方至地方衙署就任的送別詩中，姚合想像對方在衙署中即可賞玩到可構成詩歌景象的園景，據小川環樹的考察，中唐時期唐人開始出現「詩景」、「詩境」之詞彙，這兩個詞彙的出現反映將風景視為構成詩歌材料之新觀念的出現，他即是以姚合此首詩例作說明。⁵⁴淺見洋二在小川環樹的基礎上，補充白居易詩中出現「閑中得詩境，此境幽難說」（〈秋池二首〉其二，頁1764）、「詩境忽來還自得，醉鄉潛去與誰期」（〈將至東都先寄令狐留守〉，頁2126）、「樓閣宜佳客，江山入好詩」（〈江樓早秋〉，頁1292）以及其他晚於白居易、姚合的許渾、司空圖、杜荀鶴等晚唐詩人們詩中出現「詩境」、「入詩」詞彙之處，皆「表現出詩人們通過詩歌此一藝術產品的框架來審視風景的態度」。⁵⁵

由此看來，白居易與姚合兩人皆有「詩人」意識的自覺，亦是帶著詩歌審美框架賞景的關鍵人物，我們可在小川環樹與淺見洋二的觀點上，作進一步區分，白居易詩中雖然出現「入詩」、「詩境」等概念，但是，若進一步考察白居易詩中出現此兩個詞彙的詩作，則可發現他認為能夠「入詩」，成為「詩境」的風景，往往是指詩人身心處在悠閑舒適的狀態下所觀賞到的美景，換言之，白居易儘管有了以詩歌框架看待風景的概念出現，但是他判斷適宜構成詩歌題材的標準中，是以能引發身心舒適愉快的美景為主，如淺見洋二所舉的例子中：

朝衣薄且健，晚簟清仍滑。社近燕影稀，雨餘蟬聲歇。閑中得詩境，此境幽難說。露荷珠自傾，風竹玉相戛。誰能一同宿，共玩新秋月。暑退早涼歸，池邊好時節。（〈秋池二首〉其二，頁1764）

⁵⁴ 日·小川環樹，〈風景的意義〉，收入氏著，譚汝謙、陳志誠、梁國豪譯，《論中國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頁23。

⁵⁵ 日·淺見洋二，〈「天開圖畫」的譜系〉，收入氏著，金程宇、岡田千穗譯，《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76。

此首所言之「詩境」為白居易晚年在履道園中享受池邊涼爽，賞園園池月色與荷花、竹聲的佳景。至於〈江樓早秋〉：

南國雖多熱，秋來亦不遲。湖光朝霽後，竹氣晚涼時。樓閣宜佳客，江山入好詩。清風水蘋葉，白露木蘭枝。欲作雲泉計，須營伏臘資。匡廬一步地，官滿更何之。（頁1292）

則是他任江州司馬時，在江樓上欣賞湖光山色，將山水美景視為可「入好詩」的題材。

但是，在姚合的觀念中，他不僅將山水美景視為入詩的素材，如：「自古風光只屬詩」（〈和秘書崔少監春日遊青龍寺僧院〉，頁455）；同時，他也帶著詩歌藝術框架欣賞荒涼的縣齋景致：

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過城。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武功縣中作〉其十六，頁256）

縣齋還寂寞，夕雨洗蒼苔。清氣燈微潤，寒聲竹共來。蟲移上階近，客起到門回。想得吟詩處，唯應對酒杯。（〈萬年縣中雨夜會宿寄皇甫旬〉，頁207）

姚合在縣齋中所見寒雨、細雨、蒼苔、清氣、寒聲、蟲等淒冷荒涼景象皆成為適宜於提煉成詩歌的題材，可讓詩人整夜不斷地吟詠賞玩之。因此，姚合書寫縣齋詩風景不同於韋應物、白居易的郡齋詩之處，即在於他帶著「詩人」的自覺意識，將荒涼平凡之景色視為構成「詩景」的素材。

五、結論

本文認為唐代地方衙署的空間規劃與衙署園林的成熟、唐代地方官員制度，以及郡齋詩在中唐的大量出現與盛行，乃至於中唐時期「詩人」自覺意識的出現，以詩歌藝術框架看待風景之新觀念的產生，皆是構成深入理解姚合〈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不可或缺的條件。

經由上述的考察，本文的發現有三：

其一，郡齋詩與縣齋詩可歸為同一詩歌類型，一方面是因兩者皆是地方官員（州郡等級或縣級官員）生活在地方衙署中所作之詩歌，郡齋與縣齋兩者規模等級有別，但其空間規劃皆包含：主廳堂、辦公處所、官邸、園林等部分，提供了唐人創作之環境。更重要的是，郡齋詩與縣齋詩的主題，皆包含書寫周遭環境、造景遊園、吟詩會客、抒發為官之情、「吏隱」意識等面向，故可視為同一詩類。至於詩歌的心境與風格表現上，則因每位作者身處在不同等級與風土之州縣、官職際遇的差異，而可有不同風貌呈現。

其二，面對大曆、元和時期郡齋詩之代表作家韋應物與白居易，姚合顯示他對郡齋詩傳統的回顧與學習，如同艾略特所言，成熟作家與傳統之間具有一種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包括一種感覺，即不僅感覺到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感覺到它的現在性。這種歷史意識迫使一個人寫作時不僅對他自己一代瞭若指掌，而且感覺到從荷馬開始的……全部文學，構成一個同時存在的整體，組成一個同時存在的體系。」⁵⁶此一歷史意識促使姚合創作〈武功縣中作三十首〉時，在倦宦之情與「吏隱」主題的書寫上顯示他對前人的承繼。

其三，姚合在承繼傳統的同時，又能變創出切合自身生命情境與性格的縣齋組詩。就「吏隱」主題方面，則呈現「閑寥」心境；就園林風景體驗的部分，則顯示出他以「詩人」自覺意識，帶著詩歌框架眼光看待風景，將平凡荒涼的景致化為尖新之「詩景」的巧思。由此角度來看，姚合之所以能因〈武功縣中作三十首〉而在當代詩壇享有一席之地，甚至因而被稱為「姚武功」，且其詩派被稱為「武功體」，顯然即在於他能敏銳地掌握到自大曆以來郡齋詩盛行的文學脈動，加以吸收學習而創變出屬於個人風格美學的作品，故能為世所稱。

⁵⁶ 英·艾略特（T. S. Eliot），〈傳統與個人才能〉，李賦寧譯，《艾略特文學論文集》（南昌：百花州文藝出版社，1994），頁2。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南齊〕謝朓著，曹融南校注，《謝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唐〕韋應物著，孫望注，《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唐〕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注，《韋應物集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唐〕李林甫著，陳仲夫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李吉甫著，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唐〕姚合著，吳河清注，《姚合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元〕方回選評，李慶賈集評，《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清〕永瑤、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陸以湑：《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及專書論文

- 〔日〕小川環樹，〈風景的意義〉，收入氏著，譚汝謙、陳志誠、梁國豪譯，《論中國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頁1-32。
- 〔日〕中木愛，〈姚合の詩における閑適の要素——白居易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中國中世文學研究》第54號（2008.9），頁95-119。
- 〔日〕中木愛，〈試論白居易詩中生理層次的「閑適」表現——兼及姚合閑適詩〉，《中華文史論叢》第94期（2009.2），頁103-126。
- 〔日〕平岡武夫，《唐代の長安と洛陽（地圖）》。京都：同朋舍，1977。
- 〔日〕西村富美子，〈白居易の閑適詩について——下邳退居時〉，古田敬一教授退官記念事業會編，《古田教授退官記念中国文学語学論集》。東京：東方書店，1985，頁391-407。
- 〔日〕赤井益久，〈中唐における「吏隱」について〉，《中唐詩壇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頁447-462。
- _____，〈郡齋詩について〉，《中唐詩壇の研究》。頁463-481。
- 〔日〕松原朗，〈姚合の官曆と武功體〉，《晚唐詩の搖籃——張籍、姚合、賈島論》。東京：專修大學出版社，2012，頁219-262。
- 〔日〕松原朗，《中國離別詩形成論考》。北京：中華書局，2014。
- 〔日〕芳村弘道，《唐代的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
- 〔日〕埋田重夫，〈白居易の閑適詩——詩人に復原力を與えるもの〉，《白居易研究——閑適の詩想》。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3-30。
- 〔日〕淺見洋二，〈「天開圖畫」的譜系〉，收入氏著，金程宇、岡田千穗譯，《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9-80。
- 〔英〕艾略特（T. S. Eliot），〈傳統與個人才能〉，李賦寧譯，《艾略特文學論文集》。南昌：百花州文藝出版社，1994，頁1-11。

- 李正春，《唐代組詩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 李建崑，〈析武功體〉，《中晚唐苦吟詩人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05，頁129-163。
- 李紅霞，〈士人的文化心態與朝隱思想的流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91期（2007.7），頁72-76。
- 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收入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出版社，1983，頁1-29。
-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賴瑞和，〈縣尉〉，《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139-220。
- _____，〈巡官、推官和掌書記〉，《唐代基層文官》。頁287-376。
- 蕭馳，《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二）期刊論文

- 林孜曄，〈論韋應物郡齋詩之「吏隱」觀及「吏隱空間」〉，《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33期（2018.4），頁35-72。
- 侯迺慧，〈唐代郡齋詩所呈現的文士從政心態與困境轉化〉，《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74期（1997.4），頁1-38。
- 翁俊雄，〈唐代的州縣等級制度〉，《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1991.3），頁9-18。
- 張震英，〈詩句無人識，應須把劍看——論姚合反映幕府戎旅題材的作品〉，《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5期（2002.10），頁4-6。
- 張震英，〈論武功體〉，《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3期（2003.5），頁31-37。
- 陳家煌，〈論中唐「詩人概念」與「詩人身分」〉，《文與哲》第17期（2010.12），頁137-168。

- 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3），頁85-124。
- 葛曉音，〈中晚唐的郡齋詩和「滄洲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0卷第1期（2013.1），頁88-103。
- 趙鳴、張潔，〈試論我國古代的衙署園林〉，《中國園林》2003年第4期（2003.3），頁72-75。
- 蔣寅：〈古典詩歌中的「吏隱」〉，《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2004.3），頁51-58。
- 蔣寅，〈「武功體」與「吏隱」主題的發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3期（2005.3），頁26-31。
- 蕭麗華，〈試論王維之宦隱與大乘般若空性的關係——兼論王維詩中「空」的境界美〉，《臺大中文學報》第6期（1994.6），頁231-256。
- 鍾曉峰，〈中唐縣級僚佐的官況書寫——以王建、姚合為討論中心〉，《東華人文學報》第15期（2009.3），頁69-100。
- 鍾曉峰，〈詩領域的自覺：晚唐的「詩人」論述〉，《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4期（2012.6），頁49-83。
- 鍾曉峰，〈論晚唐的「詩名」：一個文學社會學的考察〉，《師大學報》第57期（2012.3），頁71-101。
- 韓學宏，〈「霄漢風塵俱是繫」——白居易「中隱」思想研究〉，《中華學苑》第52期（1999.2），頁131-158。

（三）學位論文

- 王小珊，《韋應物郡齋詩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 王海霞，《姚合及其詩歌研究》，河北：河北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 明海偉，《姚合及其詩歌研究》，湖北：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鍾曉峰，《詩藝的對話與影響：元和詩人交往詩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三、網路資訊

傅熹年，〈衙署〉，胡喬木等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引自網路電子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http://163.17.79.102/%A4%A4%B0%EA%A4j%A6%CA%AC%EC/Content.asp?ID=76118>。2017/7/26。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kai Masuhisa. "A Study of the 'Officer Recluse' Concept in Middle Tang Dynasty," *Studies on the Poetry Circles in Middle Tang Dynasty*, Tokyo: Sobunsha, 2004, pp. 447-462.
- Akai Masuhisa. "A Study of the Local-Government Poems," *Studies on the Poetry Circles in Middle Tang Dynasty*, Tokyo: Sobunsha, 2004, pp.463-481.
- Chen, Jia-Huang. "The Concept of Poet and Status of Poets during the Mid-Tang Dynasty,"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7, 2010, pp. 137-168.
- Chung, Hsiao-Feng. "The Reputation for Poetry in Later Tang Dynast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57, 2012, pp.71-101.
- Chung, Hsiao-Feng. "The Writing of County Officials in Mid-Tang: On Behalf of Wang Jian and Yao He,"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ties*, 15, 2009, pp.69-100.
- Ge, Xiao-Yin. "The poems of Prefectural Officials in the Middle and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Cangzhou Official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50.1, 2013, pp.88-103.
- Hou, Nai-Hui. "The Literati's Political Psyche and Plight as Represented in the Tang Commodity Garden Poems,"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ournal*, 74, 1997, pp.1-38.
- Jiang, Yin. "Wugong Style and the Theme Development of Official Seclusion,"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4.3, 2005, pp.26-31.
- Matsubara Akira. "Yao He's Official Calendar and Wugong Form," *The Cradle of Late Tang Poetry: A Treatise on Zhang Ji, Yao He, and Jia Dao*, Tokyo: Senshu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19-262.

Ogawa Tamaki. "The Meaning of Landscape," *A Treatise on Chinese Poetry*.
Trans. Tang, Ru-Qia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32.

On Yao He's Succession to and Evolution of the Pedigree of Local-Government Poetry: Focusing on "The Thirty Poems Written in Wugong County"

Tzu-Yeh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Yao He's "Thirty Poems Written in Wugong County" by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this group of poe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edigree of local-government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differs from previous scholars' approach of analyzing their significance in poet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em content or Yao's identity as county magistrate. The discussion process of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it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the content, and the representative authors of local-government poetry and takes them as the foundation of discussing "The Thirty Poems" in the pedigree of local-government poetry. Second, it finds support for the argument that this group of poem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pedigree of local-government poetry. The supportive idea is that Yao's tiredness about his official career, awareness of "officer recluse," and landscaping and garden visiting activities actually succeed the themes that Wei Ying-Wu and Bai Ju-Yi have created for local-government poetry. Finally, it indicates that these poems, in terms of his awareness of officer recluse, change from "leisurely comfortableness" to "leisurely loneliness"; and in terms of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garden scenery, emphasize the "poem scenery" that turns ordinariness into innovation. This demonstrates that Yao not only examines the traditions of themes that his predecessors have established in their local-government poems but creates the county-government poetry that features his personal aesthetic style.

Keywords: Yao He, "The Thirty Poems Written in Wugong County," local-government poetry, Wei Ying-Wu, the topic of "officer recluse"